

湖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It184/02

湖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中心气象台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8印张 158,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刊编号：鄂内字第0047号

定价：0.70元

目 录

九十述感

..... 邓初民 遗稿 (1)

魏人镜烈士传略

..... 何秉育 (47)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黄石大冶工农革命斗争

..... 李 实 (54)

武汉政府时期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 倪忠文 (69)

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前后

——兼及赴解放区见闻..... 李书城 遗稿 (103)

“十人座谈会”与和平运动

..... 周 杰 遗稿 (123)

我所了解的湖北省地下民盟

..... 杨春波 (130)

蒋桂求和的阴谋和湖北和平运动

..... 谈 瀛 (139)

解放前夕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

..... 梁上贤 (158)

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 文浩然 (166)

九十述感

邓初民 遗稿

编者按：邓初民同志的“九十述感”，是他在病中口述的。由他的秘书吴伯就、学生杨起华同志记录整理。发表前曾征求吴、杨两同志的意见，并对一些史实作过核实工作；民盟中央有关同志和杨玉青先生曾给予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本室李振东同志对部分重要史实进行了核实和某些修改、补充。特此说明。

光阴荏苒，我已度过了九十一个春秋。记得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六十年牛马十年人》。我感到，只有深知旧社会的苦，才能真正体会出新社会的甜，才能更加热爱人民的新中国。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我非常感激党和人民，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对人民革命事业没有多少贡献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了我极优厚的条件。特别是近年来，我已失去工作能力了，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一直得到医护同志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这样的幸福，在旧社会的六十年里，连想都没有想过啊！

自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我的视力和听觉都无可挽回的衰退了，体力已不允许我继续和同志们并肩战斗。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战。只要我一息尚

存，我的心，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同我的许许多多的好同志、好朋友相连相通的。

近来，曾有几个方面的同志要我谈谈自己的经历，据说有的单位还发表了，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同志们，仍向我要这类资料。湖北是我的故乡，武汉地区是我在大革命时期最初接受党的直接领导，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也乐于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地讲得详尽一些。我所经历的年代，正是我们祖国翻天覆地变化极大的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最复杂最艰苦的条件下，最顽强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期。所以作为我个人的事迹，是毋须多说了。但是，通过我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段历史的发展；反映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同国民党两度合作，又两度被分裂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了解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的可歌可泣革命业绩；这些都是值得记载的。只因我的精力不够了，难于谈得详尽准确。遗漏和错误之处，尚请知情的同志们加以补充指正！

我准备着重地谈“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的经历和见闻。

(一)

先从我的家庭和少年时期的情况谈起。

我是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江北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祖父是个佃农。父亲在贫寒的家境中，勉强而又刻苦地读了几年书，后在家乡做塾师并当了中医。他在桑梓行医，不收诊费。所以我的家庭生活，一直极其困难。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黎明即起，忙了家务，还要下地干农活。母亲最疼爱我，对我管教也很严。记得有一次她要我到

邻村借一把剃刀来给我剃头，我借到剃刀路过一个池塘时，好奇地捉到一只青蛙进行解剖。不料解剖完毕，匆促中再找不到剃刀了，只好空手回家扯谎说：“人家不肯借”。几天之后，来讨还剃刀的人揭穿了我的谎言，母亲非常气愤，顺手拿起一根竹棍，撵我去池塘边寻找，边走边打，边对我进行教训。她认为：失落剃刀是一时疏忽，疏忽是可以原谅的，扯谎便是欺骗，欺骗是不能容忍的。她以劳动妇女的正直思想感情，对我进行了一次痛切的告诫，教育我从此要正确的立身处事。剃刀在草丛中找出来当即归还了原主，但是母亲的“竹棍教育”，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我不能忘怀。

我读书主要是靠父亲多方筹划的。从五岁起，就在既是严父又是严师的私塾里发蒙。三年一气读完了“四书”等几本书，虽然在文字上背诵得烂熟，但对内容根本不懂。当时私塾的教学，以孔孟之道为主导思想，而孔孟之徒是极力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所以听了不少“法先王”的故事。我在听这些故事中，对大禹治水的事迹感受最深。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并非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因而他在对我讲述这类故事时，也着重突出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这在我幼年的心灵中，立下了“舍己助人”的英雄形象。于是在我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取名“希禹”。毕业后又考入荆南中学。

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正值康、梁企图以“变法”手段来挽救腐朽的清廷。经过帝党、后党之争，慈禧太后完全掌了实权。她倒行逆施，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连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对国内人民，则更加残酷地进行压榨，搞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我的家乡，也和其它农村一样，冻死饿死者比比皆是，我的一个族兄就是活活饿死的。在这种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中，促使我思考着富国救民之道。

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在荆南中学，曾和同学们到校外宣传孙

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但也只是宣传，实际上怎样救国救民，如何进行革命，仍然是模糊的。

辛亥革命之初，在我思想上曾得到一时的振奋，以为国家可望从此好起来。我到武汉考入了新筹办的准备以宋教仁先生为校长的江汉大学。实际上宋教仁没有到职，学校也并未正式上课。但是校内有一个在辛亥革命战斗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他自名“林一足”经常邀集同学宣传社会主义，散发社会发展史的书籍。这时我才知道：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依靠集体力量才能获得生存，而且收获物很少，平均分配之后没有什么剩余产品，这就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我很向往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的人，所以又改名“初民”。

1912年，孙中山先生被迫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但国民党在国会议席中尚居多数，宋教仁想借此以“政党内阁”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被袁密谋刺死于上海，江汉大学也就此停办了。辛亥革命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就被北洋军阀践踏了。事实告诉我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事实也促使我去进一步探讨革命的道理，于是下决心出国留学。但是，我家很穷，在国内读书已很不易，出国就更加困难了。幸而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他多方请求亲友襄助，我在1913年5月东渡日本。

(二)

我是为追求革命真理而去日本的，所以投考了东京法政大学，但这是一所专收学费并不严格要求学生学习、在管教上也比较马虎的学校，要学到一点东西主要靠自修。那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河上肇教授正在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如饥似渴的去听

课。此时，日本已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译著，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为了阅读这些书籍，我又在私立日文班专学日文。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要做皇帝，竟同日本当局签订了“二十一条”。这个窃国大盗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忿慨。我们不顾日本当局的种种压制，立即掀起了反袁运动，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一位东北同学任总会会长，我任总会评议会会长；李大钊同志任总会文书干事，起草通电，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现已载入李大钊选集）。接着李大钊同志和湖南留日学生总会经理易象同志（田汉的舅父）同我商量，决定出版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月刊，名叫《民彝》。李大钊、高一涵和我都是编委，李主编了第一期，高编了第二期，我编了第三期。这刊物的名字，是易象同志定的，意思是“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主要内容是反袁称帝。后来李大钊、高一涵两位回国，又因为这个刊物与日本当局的胃口不和被迫停刊。

我和李大钊同志在日本时，除了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以外，还同一些被袁世凯解散而到日本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共同组织了一个“神州学会”，积极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讨论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神州学会”的会计。该会结束后，还印了一个会员通讯录。李大钊同志为了直接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北京办了一个周刊，要我经常写留日同学爱国活动的通讯，每月给我一点稿费，勉强维持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不少进步朋友，对革命的道理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进一步的

(三)

我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于1917年和易象同志一起回国。在海船上获悉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我们欢喜若狂，认为这就是中国要走的路，我们带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回到武汉，我认识了施洋律师。他热情似火，满身都是活力，要我留在武汉工作。但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我这个留日学生照例找不到一个吃饭的职业，只好回到老家。在家乡见到当地土豪劣绅依然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特别是见到骗卖妇女，非常气愤。我联合几个中学时的同学，揭露这类丑恶罪行，却遭到当地军队的蛮横干涉。我感到以一个穷途落魄的洋学生，同封建地主恶霸作孤军抗斗，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此，又陷入苦闷、彷徨、挣扎之中。

1919年6月，忽然接到在山西的一位原“神州学会”的朋友的来信，说他在太原法政专门学校当校长，邀我去教中国语文课。于是变卖了一些东西做路费，赶赴太原。

在去太原的途中，得知爆发了“五四”爱国青年运动，心想到太原后立即投入运动。但当我去见那位校长时，他竟然要我用日语同他谈话。这是始料不及的怪事。虽然我在日本曾用心学过日文，但并没有认真学说日语。这样，请我教中国语文的事就搞吹了，而且路费也用完了，困在一家小旅馆里。在这进退维谷的意外遭遇中，我写了一篇《旅晋一星期有感》的短文，投到山西日报发表了。事有凑巧，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看到报纸，派人找我去面谈，决定留我在太原，先住进山西省图书馆。随后，要我代他写一本参加辛亥革命的回忆录，每隔一段时间，就找我谈一次话。我就借此机会，在图书馆涉阅书报。

不久，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山西日报”派我当代表，我乘机去看望了李大钊同志。他的住所很简朴，一见面就说：“从前我们在日本办留日学生总会月刊的那位编辑，今后再见到时，不要同他多谈什么问题，因为他的思想很落后”。李大钊同志接着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热诚地指示我如何教育学生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阎锡山当时野心勃勃，在山西搞“门罗主义”，对外省的军阀混战，暂时保持中立，一心要闭关“自治”。他除了用“进山会议”等政治组织拢络上层人物之外，还大办学校，培养骨干。有一次阎锡山对我说：“你想当官可以做县长，想教书就去进山中学”。我说：“最喜欢住清水衙门”。我后来在山西的实际工作，就是在阎锡山办的“进山中学”和一所外语学校里教中国语文课。我就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青年、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工作方面了。当时山西省图书馆利用阎锡山的这种“开明”政治，大量购买新书刊，其中先后购有新译的马列著作，以及《新青年》、《响导》和由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等。我从中选一些政治论文作语文教材，向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很受欢迎。我除经常与进步师生往来，还到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等学校进行活动。我们还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并出版一个小型刊物《新觉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怎样改造中国》的文章，从社会发展史论断中国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一些进步同学，后来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并作出了贡献。张友渔同志就是当时极为热情积极的编辑之一。这当然是阎锡山所始料不及的。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在太原工作了五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后，紧接着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贯彻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经过

协商，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条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确认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我得知这些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大消息时，感到无比的兴奋。特别是当我知道李大钊、毛泽东和林伯渠等同志不仅参加了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之后，我决心回南方参加革命。当时虽然阎锡山把我待为上宾，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决心离开太原。恰好，湖北法政大学（校长张知本）聘我当教务长，我未经阎锡山的同意，就于1925年2月回到了武汉。

（四）

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里，我有幸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引下，开始直接接受党的领导，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决心在党的旗帜下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

我到政法大学不久，董必武同志亲临教务长室，邀我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他当时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负责我党在湖北地区的统战任务的，所以我极其高兴地答应了。之后，他先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接着又参加了一次秘密集会，按照国民党的新党章，改选省党部的执、监委员会。选举的执委和候补执委约二十人，我记得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董必武、吴德峰、钱介磐、蔡以忱、陈卫东、袁翰之、陈潭秋和他的爱人徐全直，以及李时哲（即现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李文宜同志），非共产党

员有詹大悲、李汉俊、何羽道和我，还有孔庚、孙科等。李汉俊、何羽道和我被选为执委会常委，郭树勋（述申）为秘书长，吴德峰兼公安部长，李哲时是妇女部长，我先任青年部长后任宣传部长。

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是有生气的，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尽管北洋军阀政府仇视和镇压革命，但人民群众仍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天夜晚，陈潭秋同志特意到我家中作了一次长谈，我们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各个方面的看法完全一致，他最后征求我入党的意见。我当时仅考虑到自己有爱出头露面、夸夸其谈的缺点，这对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一个地下党员来说是极不利的。所以我考虑了一阵之后，郑重地对陈潭秋同志说：“我感到还不具备入党的条件，我在党外工作，可能比在党内更为有利”。我向他表示，今后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条件下，我坚决听从党的领导，按照党的路线行事。陈潭秋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在以后的行动中算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是，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错过了及时争取入党的机会。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兵分三路，开始北伐。其主要战场在两湖地区，因为北洋军阀中吴佩孚的主力盘踞在这里。当时的革命形势大好，群众痛恨北洋军阀，北伐军士气很高，沿途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约在七月中旬，一举占领了长沙。

此时吴佩孚调其精锐部队在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两处固守，企图顽抗。并宣布他亲往前线“坐镇”、“督战”。但是北伐军势如破竹，连陷敌阵。吴佩孚在前线亲斩几名败将，也无法挽救败局，只好狼狈逃窜。北伐军一鼓作气，于八月底直逼武昌城下。吴佩孚又严令其湖北督军陈嘉谟和第八军军长刘玉春死守城垣。

他本人退据汉口，调兵遣将，仍图反扑。因武昌城防坚固，火力猛烈，北伐军连续攻城，均遭顿挫，乃改围困战术。约九月六日，由武昌上游抢渡长江的北伐军何键、夏斗寅两部，逼近汉阳，守敌吴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宣布起义，北伐军遂进入汉阳。组织上命我前往召开群众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和庆祝。吴佩孚闻风北逃，汉口也宣布光复。汉口光复后，董必武同志在汉口西商跑马场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会，湖北省党部即行公开活动。

这时，武昌城内的顽敌仍作困兽斗，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学生领袖陈定一被杀害于孔庙前，并悬首示众；而陈潭秋同志等仍继续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奋不顾身地进行瓦解敌军的地下活动。直至10月10日，北伐军最后攻入武昌，生擒了陈嘉谟、刘玉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万众欢腾。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便于开展工作，董必武同志命我到武昌接收前议会的房屋（即现阅马场红楼），作为省党部的办公处所。还筹组了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公推邓演达为主任委员，董必武同志和我都被选为委员。随后又以省党部和政委会的名义，开办了党务训练班和文官养成所。董必武同志和我都在其内任课，这些学员，后来在各县党政机构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当时武汉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各方面都要求将广州的国民政府北移，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在北伐军克复南昌后，即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号令一切，并要留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图实现其独裁统治。12月上旬，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由广州到达南昌。蒋介石施展了各种伎俩，但是宋庆龄等人一致反对迁都南昌，随即转道武汉，并于12月13日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的联席会议，积极筹备迁都武汉的事宜。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后来他便一手造成了“宁汉对立”和“国共分裂”。

约在十二月下旬，由湖北省党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包括各界代表五十多人的“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目的是争取蒋介石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到达南昌的当天，蒋介石在旧督军府举行了接受慰问锦旗的仪式，晚上设宴招待代表团，蒋致欢迎词，我致答词，另有几位代表也讲了话。我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团结，希望蒋介石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进行了几天慰问活动，并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介石仍然坚持迁都南昌，并企图将尚在广州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挟持到南昌。我们于十二月底回到武汉。

回到武汉后，各界要求迁都的呼声更高了。因为迁都武汉实质上就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就是保证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从一九二七年元月至五、六月间，在武汉地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是较好的。我想从自身经历的几个方面，谈谈当时的情况：

第一，重新改选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正式组成了湖北省政府。省党部从一九二七年元旦起，召开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会期原定十三天，后因欢迎蒋介石到汉，又延长了一两天。会议根据新的形势，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还发了几份通电和宣言，如要求迁都武汉，敦促汪精卫回国复职等等。当时我任大会秘书长，这类文电是经我起草的。按照新党章，本来还不到改选的时间，但为了调整和充实领导力量，还是改选了执监两委。选出第三届执委十五人：孔庚、孙科、徐谦、董必武、钱介磐、李汉俊、陈荫林、张明轩、周廷璜、何翼人、罗贡华、郝绳祖、吴士崇、张眉宣和我。候补执委九人，其中有李时哲、郭树勋等，为贯彻集体领导制，不再设书记长，由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三常委主持工作。

元月下旬，在湖北政委会的基础上，改组为湖北省政府，选出委员十一人：徐谦、孙科、邓演达、孔庚、宋子文、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董用威和我，还有刘佐龙也被选为委员。

第二，在欢迎蒋介石的同时，对他提出恢复党权，限制军权的警告。蒋介石于元月十二日由南昌到武汉活动了六天。武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和群众集会、宴会等，董必武等领导人曾分别出席并讲话。蒋也搞了一次答谢宴会，并到军校训话，到学兵团校阅，最后一天晚上是在汉口普海春宴会后直接登轮去九江返南昌的。

当时以湖北省党部为主，在筹划欢迎蒋介石的各项活动中，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在蒋介石未到武汉之前，省党部代表大会就发了通电，欢迎（实际是督促）他和他所控制的那些中委一起到武汉来。在欢迎大会上赠送蒋介石一面凯旋旗，上书“党国柱石”四个大字。董必武同志在欢迎词中讲得很策略，他说：欢迎蒋总司令，并非欢迎他个人，而是因为他贯彻总理遗教，实行农工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董必武同志还特别讲到，国民革命不仅是要打倒北洋军阀，还要从社会基础上进行革命，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等等。大会口号也很策略，既有“欢迎蒋总司令”的口号，也有“打倒西山会议派”以及“昏庸腐朽分子站开”的口号；会上更突出了“恢复党权”、“提高党权”的呼声，这是对蒋介石的严重警告。省党代表大会闭幕那天，又专请蒋介石讲演，而由徐谦任主席。这些大事原则上都是董必武同志掌握的，我对其斗争策略和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从中获益匪浅。

蒋介石这次是同何香凝女士、顾孟余部长一起来武汉的。原想把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拉到南昌去，但他在武汉的六天活动中，所到之处都是一片迁都武汉的呼声，而且有不少的代表在发言中还要他当面答复，他也不得不表面应付一番。以后何香凝、顾孟余留在武汉，蒋介石只好悻悻而去。

第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回南昌后，仍然控制着几位中委不放，以致三中全会不得不一再展期，经过反复斗争，最后除蒋介石和张静江外，其余的中委均次第到了武汉。为此，

湖北省党部开了一次庆祝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和国民政府迁鄂办公的群众大会，组织决定由我担任主席。我在大会发言中痛斥了张静江，说他是阻挠迁都的幕后指挥；大会口号中，不再是要他站开去，而是喊打倒了。

三中全会于三月中旬召开，约开了七、八天，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如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军事委员会，解除了蒋介石的部分职务，限制了他的军权，从政治上和组织上要蒋介石服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而不准以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会议正式决定，请汪精卫回国复职，恢复汪在广州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新改组的军委会中，林伯渠同志担任秘书长。并决定将武阳夏三镇划作首都，定名武汉。

会议期间，宋庆龄女士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中的中央委员，与少数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和董必武同志虽然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委，但由于三中全会有人缺席，所以他们被补为正式委员，有了表决权，因而会议是开得比较成功的。

第四，起草惩治和审判土劣条例及逮捕审判土劣。从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以来，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极大地引起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的恐慌与仇视。革命队伍中也有“过火了”、“糟得狠”之类的议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左派还是假左派的分水岭。

当时有不少县党部呈报当地的土劣逞凶，杀害农民和国民党员的事件。省党部批复他们协同县政府办理，并要县民政科拟具办法。因为那时省党部虽然感到问题重要，但是，因武汉光复不久，对各县的工作尚未深入下去，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所以希望先从县里吸取经验，然后再总结推广。

约三月初，接到阳新县党部的报告，该地土劣造谣惑众，说共产党“要挖祖坟”、“劈祖宗牌子”、“共产共妻”，煽动红枪会包围县城，抓去省农协特派员和县党部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共